

30 1978
2008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30

中国西部减贫 与可持续发展

*Poverty Red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郑易生/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西部减贫 与可持续发展

*Poverty Red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郑易生/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郑易生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2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0477 - 6

I. 中... II. 郑... III. ①地区经济 - 可持续发展 - 研究 - 西北地区 ②地区经济 - 可持续发展 - 研究 - 西南地区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5777 号

·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

中国西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

主 编 / 郑易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高中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张 / 16.25

字 数 / 276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477 - 6/F · 0168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今年，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像孔子一样，非常有信心地说中国是真的“三十而立”了，尽管今后的路还很长，中国仍要“志于学”。

想要了解世界在过去30年中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回首过去，即便是最乐观的改革拥趸者们也会吃惊于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规模。中国国内曾经敦促中国赶超英国的有关人士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在国际贸易方面赶上了美国。30年前，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曾预言日本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那个时候，他们绝不会想到，中国在几十年中会取代日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在此之际出版这套丛书，其首要目的是对中国在过去30年发生的变化做一个全面综述。在这3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福特基金会有幸亲历和亲睹了中国的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福特基金会启动了它在中国的第一个资助项目——资助中国学生和学者到国外学习和研究。从那时起，基金会就为中国杰出的研究人员、有才干的政府官员以及坚定的社会和文化工作者们提供资助，以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2007年，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任基金会首席代表华安德先生邀请中国知名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一起编写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基金会这些年资助过的九个领域。这套丛书意义非凡，展现了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路程。

本丛书的第二个目的，是汲取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厘清方向。如果把中国今天的发展和繁荣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情况作比



较，我们有一切理由为此感到骄傲，但许许多多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員们不满足于此，他们希望知道中国在经济改革中的成功是否可以转化到其他有需求的领域，如法律、行政或治理改革。

作者们的评价和结论都是各持己见。一方面，经济学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庆祝，因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其既定目标；放眼未来，他们还要向更高的目标奋斗。另一方面，社会、法律和行政学专家们则刚刚开始界定衡量进行法治和治理改革所需的目标和指标。

本丛书的第三个目的，是让世界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世界不仅需要了解中国，而且要给中国了解全球化创造空间。国外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改革经验的杰出实证研究，但迄今为止，从更广阔的理论或者普遍的意义上而言，中国的经验并没有给国际学术界留下深刻印象。这套丛书将促进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发生的巨变，也有助于加强有关中国这 30 年在世界历史当中的重要意义的比较性和理论性研究，同时有助于在未来几十年里更准确地评价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

最后，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有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可以把 30 年改革开放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经济、社会、文化、法律、行政、政治、外交、教育、环境及健康等——都整合在一起，为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一个综合的回顾和展望。这套丛书是迈向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它试图把各领域的丰富经验和专家声音集中在一起。

没有编者、作者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不懈努力，这套丛书不可能得以出版。在此特别感谢本套丛书的编者、作者，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和他能干的同事，同时也要感谢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同事们。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

2008 年 9 月 11 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郑易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发表论文包括：《90年代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估算》、《自由交换、自由权利与自组织行为——中国经济关系契约化进程》、《中国经济发展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公共资源与公共秩序——有关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论》、《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利益》、《中国的环境与经济至上主义》。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关于资本部分）》、《深度忧患——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主编）、《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主编）。

林 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院学术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区域经济。著述、主编、与他人合作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论》、《四川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三线生产布局研究》、《产权制度改革与资产评估》、《利润周期与经济周期》、《林凌选集》等。

刘世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和西部大开发研究。主要专著有：《企业产权交易》、《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经济转型》、《长江上游经济带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政策研究》。论文有：《利润周期与经济周期》、《我国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方向》、《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新挑战》等。

李 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农村发展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生态经济学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评审委员会委员。1994 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从事生态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至今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改革》、《管理世界》、《比较》、《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林业科学》、《林业经济》和《美国经济评论》、《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英文论文 18 篇。主要著作有：《中国贫困山区开发方式和生态变化关系的研究》、《化解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研究》、《中国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

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1987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事农村发展研究，曾出版《中国乡村的民营企业与家族经济》（合著）和《中国村庄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合著）等。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转入社会学研究所，出版了《村庄内外》（合著）、《农村工业化与民间金融》（合著）等。近年来从事生态环境的社会学研究，发表了《政策下的管理缺失》等论文。

马 军：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1999 年完成《中国水危机》一书，提出须改变治水思路，应对水资源危机的挑战。2006 年 9 月，该中心发布我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可以检索到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 300 家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水污染地图中还列出了超过 2500 家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若干跨国公司），帮助公众获取当地环境信息，推动企业承担环境责任。被评为 2006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韩 伟：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1982 年大学毕业后，从事了 10 年环境保护科研工作、10 年扶贫工作、5 年农村发展研究工作，担任过政府官员、培训老师、农村发展研究者、发展项目的协调员、发展项目的组织实施者和专家顾问等多种角色，主持过一系列农村发展与扶贫研究课题。出版专著有《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管理》，合作出版有《参与式社区评估实用指南》、《参与式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实施管理指南》、《参与式小流域规划设计指导手册》、《集体林可持续管理指南》、《民间传统知识田野工作指南》。

于长青：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生态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员。业务专长：保护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生态恢复、生态保护项目规划管理。先后在中国农科院、中国林科院从事野生动物研究，1996 年 10 月至 1997 年 4 月



担任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 (GEF) 中国保护区项目咨询专家, 随后历任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中国项目办事处物种与保护区项目咨询专家、项目官员、物种保护项目部主任, 及 WWF 大熊猫保护协调委员会主席、WWF 大熊猫保护项目负责人等职,

张世秋: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 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与管理相关研究与教学。同时担任联合国环境署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技术与经济评估委员会资深专家、《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 2003 ~ 2011 共三届“增资方案”特别工作组共同主席。曾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环境经济学专家组以及资源定价与税收特别工作组专家, 主持多项国际和国内重要科研项目。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杂志发表《环境政策边缘化现实与改革方向辨析》、《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之道: 从部门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环境资源配置低效率与自然资本“富聚”想象剖析》, 以及“Marginal Cost Pricing for Coal Fired Electricity in Coastal Cities of China: the Case of Mawan Electricity Plant in Shenzhen City, China.” (with Duan Yanxin) 等论文。

安树民: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师、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主修环境经济学。目前从事环境经济学与环境管理和政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任晓冬: 贵州师范大学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副教授。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从事农村发展的行动研究, 特别是关注贫困地区农村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结合的研究和项目干预。在贵州参与筹建了贵州 PRA 网, 在贵州的草海、梵净山等保护区进行了多项把社区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的行动研究。已经在各种专业杂志发表论文 20 余篇, 单独和合作出版专著 4 部。

黄 晓: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和贫困地区的妇女发展研究。2000 年开始接触社会性别与发展, 曾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的研究。

蔡 葵: 人文地理学博士, 云南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教授。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事农村自然资源管理、社会性别发展等的研究和贫困干预。已经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学术文章 20 多篇。

引言

为什么需要更多的视角？

郑易生

一 西部资源的多重价值与面临的变化

对不少人说来，西部地区的魅力和引人关注之处似乎是与“落后性与原始性”相联系的：大量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大片荒野与人迹罕至的自然环境；奇异而多样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形态，较多的贫困，其中包括国内最为贫困的地区……这些特点，吸引着投资者、旅游者、环境保护者、扶贫志愿者、文化人类学者……不过，这些兴趣多是出于外部人的视角，特别是出于东部发达地区视角看到的西部价值。也许，这与外国人来到我们中国时的想法有一点相似。假如我是一直在西部地区生活的人，肯定会有与此不同的感觉。

视角决定观感。对于中国西部发展，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个包含多种视角的研究呢？既然有价值的自然资源是西部地区许多重要活动的源头，我们就以它作为研究的线索，以便凸显西部地区问题的特点和了解人们不同观点的由来。

三种价值

大致来说，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有三种不同价值。它们是：经济增值的价值，对于全国的“公共价值”，支撑该地区人民生存的价值。每种价值都对应着人们利用或维护它的方式以及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与其直接或强烈相关的利益群体）。

自然资源蕴含的经济价值首先是前来投资的人眼中的价值，主要表现为西部大量尚未挖掘的矿产、能源资源、野生生物资源、未被“产品化”的风景区和自然景观。这些价值通过资源开发的方式得以实现——即从资源转化为市



场产品或是被改变了原来的使用方式（如将水流转为电能，将牧场变为煤矿）之后得以市场化。其物质条件是资本（包括技术与基础设施）。而在西部，资本往往是开发的瓶颈，这是东部资本的机会，也是许多人心目中西部大开发的要义。

“公共价值”是关注我国整个生态系统安全的人眼中的价值，这里指的是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生态系统屏障的功能。世纪之交，凶猛的长江大水和沙尘暴令我们开始对西部广大山区和草原刮目相看：它们的生态功能关乎整个国家生态系统的安全，这个价值是很难用眼下的市场价值来衡量的。此外，西部还具有世界意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有些已被列入联合国认定的世界遗产（例如云南的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环境公共价值主要是通过国家力量支持的方式（行政、法律和生态补偿政策）维护的。当然，西部地区对全国的意义还有政治等方面，远不限于环境。

最后一类价值，即西部自然资源支撑该地区多数人自身生存的价值。它似乎是西部地区剔除上述两种“特殊”价值之后“剩下”的价值，因而在一些场合容易被忘记。这一价值是通过该地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的。贫困或与外界疏远的农（牧）村社区几乎是直接依赖于农田、森林、草原等而生存。但是，这个对当地人民生计提供支撑的价值，由于其实现方式被视为落后而变得十分易受侵犯。一是与那些只需要生态功能服务的内地人不同：这里人民的生计与生态系统息息相关，这些生态系统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二是与外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投资不同，这里地方性的经济系统（包括农业、畜牧业、工业）总体上商业竞争力较低，但具有较大社会容纳力——这一方水土不仅养活了一方人，而且维系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以“效率”（即利润）的视角看待一切，我们必然会否定这一价值，这种做法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价值关系的两个大的变化

资源的不同价值的“同居”可能是今日西部地区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它意味着在环境中，信息时代、工业时代、农业时代理性共存，现代、“前现代”，甚至“后现代”问题重叠。不同价值对应着不同的利益相关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一直处于迅速变化中，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发展获得了市场经济的动力，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则使之进入加速变化阶段。这是整个国家的



市场化及其推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的结果，而它们又处于经济全球化与环境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中。外部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①西部大规模的矿藏与能源等资源的资产化（市场化）进程产生的新增价值急剧扩大。开发自然资源是西部发展中最集中、最有力的部分，资本的扩张是其主旋律。国家工程和招商引资使落后地区沉睡的资源被唤醒，引起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②另一个变化是西部生态环境升值的态势。对西部地区的巨大公共价值的认识将西部与全国紧紧连在一起。2000年西部大开发一开始就强调“以生态保护为中心”，近年我国关于“绿色GDP核算”、“跨区域生态补偿”、“主体功能区划”等方面的努力，显示了用环境价值观调整西部工作的动向。

上述两种变化都深刻改变着西部与外部、西部内部的利益关系。目前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的许多挑战，都与其怎样适应这个新变化有关。在怎样协调不同价值与利益上，问题往往集中在：我们是承认上述所有价值及其相关者的利益之合理性，还是只承认其中一个价值及其相关者的利益之合理性？

二 来自不同视角的问题

问题一：经济价值挤压环境价值——来自国家视角的担忧

西部大开发的资源开发力度历史空前，巨大的利润和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都是空前的。与其他地区比较，西部地区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在相当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东部发达地区环境问题的转移，并且总是与贫困问题缠在一起。现在无人不说“以生态环境为中心”，因为这是国家的西部开发方针。但真实的东西表现在对上马项目的选择中。若从这个层面观察，情况不容乐观。从转移环境问题（包括破坏性开采自然资源）这个被不少地方默认的事实背后，流行着一种对抗国家环境目标的顽强逻辑：即这是落后地区发展阶段决定的必然性。从眼下看，在西部地区，保护环境的力量远远不如片面搞资源开发的力量。“欲要取之，必先贬之”——有些人总想证明开发商看中的资源“不是真正的原生态，不值得保护”之类的扭曲逻辑。而对于完全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显现出来的生态灾难，他们又利用人的短期偏好和科学的不确



定性予以否定或回避,拒绝遵循“谨慎的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若干年后,面对西部生态系统那些难以逆转的损害,我们的后代一定会责问:当年导致这些后果的行为是否真的必要?或者这只是为了怕失去“野蛮开发的超额红利”?

问题二:资源价值的归属?——地方政府的两难

我们看到,一些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做法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原则,而涉及环境、国土、生态系统的部门夹在块块条条掣肘之间,常难有作为。这看似是环境与发展部门间的角力,但与经济关系问题没解决好有关。例如资源大开发的收益应主要归谁?国家或某些部门的视角与地方视角有不同的倾向及其不同的逻辑:强调全国统一市场和整体效率的原则,还是历史的公平(如西部一些区域由于开放滞后和长期不平等交换积累形成的劣势问题)?西部资源东运的主要收益方应当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资本?怎样具体确定地方在国有资源上的权利?这些问题,无论从概念还是手段上看,都缺乏足够的明晰性、规范性和切实执行的力量,都存有部门化、人治化的因素。环境问题,如管理环境与资源的责任属于国家部门还是地方等,很大程度上也是上述经济利益矛盾的延伸。

问题表现在地方,但反映了国家财税体制和资源管理体制的缺陷。如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迫使地方税收过度依赖GDP增长;由生产地或企业注册地征税的税收征管模式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还导致“政商结合”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不计代价。财政体制的缺漏在造成省级以下地方财政严重困难的同时,未能有效发挥地区间财政均等化的作用;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则又逼得地方“跑部钱进”。地方政府在提供辖区公共服务的同时,又承担着发展辖区经济的重任。由于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地方不得不“自谋财路”,特别是依靠租售自然资源来开拓财源、刺激投资。^①一些论者只看到地方政府之间经济竞争对增长的激励,没有看到在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资源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的前提下,它已变成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

^① 沈可挺:《地方与中央:投资冲动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57页。



间在国家资源开发方面的收益权、环境保护的责任、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内耗性博弈，甚至产生了一种看谁更能消耗国家公共资源的比赛。

从地方视角提出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建立全新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这一改革已经开始）及其他改革，使拥有巨大生态价值的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从GDP枷锁中解脱出来？怎样让西部地区得以从容不迫地从资源开发中获益？

问题三：双赢之下有无“失败者”？——来自一些普通群众的感受

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农村社区支撑农民生存的价值也面临挑战和巨变。第一种情况是“得天独厚”——巨额利润潜藏在他们祖辈居住之地的底下：草原下的煤矿，土壤中的金属，河流中的水能，森林中的珍稀生物，家园的美景……巨大的市场价值使之成为投资者开发的目标。第二种情况是：生态非常脆弱而当地人又极端贫困，但此处的生态对下风下水的生态影响特别敏感。这类“三合一”的地方有机会成为生态补偿的对象。第三种情况是贫瘠而且平常，不具有吸引外人的魅力（不是“靓女”，不是要冲，不是典型），没有多少可与外界交换的价值。总之，农村社区面临深刻的分化与动荡。

我们知道，许多地方的老百姓从新一轮资源开发中受益匪浅，乡镇或村庄也面貌一新。但也应承认，在另一些地方，本地群众远未相应受益，甚至因失去原来使用资源的方式而陷入困境。他们本是政府服务与保护的对象，但偏偏在资源的市场化过程中，屡屡出现“两强剥夺两弱”的现象——即政府与公司联合创造出“双赢”而以农民前途和生态环境为代价。近些年来，西部一些地方出现的“圈地”、“圈水”、“圈风景区”和污染转移（即本地居民环境容量的出让）等热潮就是例子。这些案例成功地挖掘了资源潜在的经济价值，但其可观的利润是否都归因于开发商的投资（即资金的回报率）呢？如果说这个利润中含有资源收益（资源租金）——地方政府通过向外来的开发商转让资源使用权而获取的收益，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截留的农民的权益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西部地区资源对本地居民的价值（维系其生存）实际是一种权利，一种他们进入市场时本应有并发挥作用的权力，它不应因为资源开发者的投资而被剥夺，尤其不应在市场化开始的阶段。我们近些年来扶贫事业的成功千万不要被新的造成农民困境的因素抵消。

这些从社区或相当一部分普通群众角度产生的感受提示我们：以调整中央和



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主线的财政体制改革思路，尽管能够缓解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冲突，但还不能解决地方政府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责权问题。

问题四：怎样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少数民族社区？

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它与内地的联系更紧密，同时，西部大片生态系统被国家列入需要保护的范畴，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工程。生态价值的增值是西部人民的机会，但能否把握这个机会取决于这一增值过程能否与当地社区的健康成长相结合。西部有很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或偏远地带。从生态的角度看，正是靠“落后性”和“不开放性”，它们才保留了这些今日人们倍感珍惜的自然财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其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着（而主要不是改变着）这里脆弱多变的生态环境系统，由此形成的各种“绿色文化”传统一直为我们长期看护这些财富，直到今天。近年来，草原文化、山区“神山圣水”等充满生态智慧的行为方式已经引起许多东部人士的认真反思。因此，如果我们的环境工程忽视或轻视这些既有的社会经济特点，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成为损害社区利益的因素。

例如，人们发现自上而下的工程设计在对付（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变化多端的草原生态系统时显得机械呆笨，甚至事与愿违。原因一是过多套用发达地区（农业地区）的做法和理念，二是为了政策自上而下贯彻的方便而宁可回避复杂性，忽视了这里的差异性、文化传统和牧民的智慧与知识。我想，这也许与我们从高层视角俯视“边缘化的落后地区”时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与偏见有关。

西部地区一些生态极端脆弱的地方开始了生态移民。这是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手段，有的已经见到了成效：生态系统与移民生活都得到了改善，体现了西部地区生态价值的增值给西部人民带来的机会。但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慎重预防的情况：一是居民并不是生态退化的罪魁祸首（如在一些牧区，是一系列政策的多年影响而不是牧民的存在加剧了草原退化），却被迁走；二是（在确实需要减少人口的地方）把不该被迁出的原住民迁出，而他们原来赖以生存的资源由“更有能力者”获得；三是一旦少数民族生态移民成为“领取低保的”新市民，他们可有自立的生计？今天在西部，经济价值的巨大潜力与生态价值的增值都进入了决策者的计算范围，但是，社区视角的价值是否得到了相应尊重？如资源中属



于社区或居民的权益、社区传统文化的存在……^①注意，判断社区的价值离不开社区居民自己的感受，它不能由别的视角来代替判断与计算（如某些统计数据、市场价格等），否则社区的权益可能被剥夺，不论这种剥夺是从“带来现代化”的好心出发，还是以“保护生态”的名义。而如果环境增值是以破坏这些社区为代价，那么在这种增值的背后将隐藏着很大的风险。

综上所述，价值的多重性需要从多个视角去发现，我们要注意西部发展中多种利益和多种方式方法的合理性。

三 避免单一化

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与它和东部、中部地区的互动分不开的。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西部地区的相对不发达决定了它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理论的探索而是东部经验的应用，即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市场化向这里的转移。这种思维方式无助于人们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上述问题不能仅仅被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痛苦与代价——历史上有多少国家的现代崛起不经历一系列“创造性的毁灭”呢？这些问题的意义也许还在于：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各方参与的方式不同很可能决定这个过程的结果。对于西部地区资源资本化进程，我们不是在承认还是不承认它，或是在欢迎还是抵制之间选择，我们选择的是现实条件下实现它的更好做法。这一选择影响的不仅是西部现代化的进度，而且还影响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是否成功。

将西部地区发展等同于东部地区做法之“西移”的做法，与在我国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有相似之处：都是过分突出集中性的技术经济因素而比较忽视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在这种理念下，人们很容易将一个较为传统的社会或地区向工业化社会变迁的过程“化约”为一系列工程的布局或资本的扩展过程。体现在政策的价值观念上，就是只尊重经济价值，不承认其他价值的独立性；用市场价值衡量一切、调整一切，甚至借助行政力量“铲平”一切妨碍它

^① 即使从人们希望更现代生活的愿望出发，如果仅以目前的市场价值计算，也会过低估计本地经济发展的真正优势，加上急于求成，社区就可能将把握独特机会的权利过早地让渡。外资协助、推动还是取代本地生产能力，其利弊取决于许多因素。在这里，我们只是再次强调“社区价值”的存在，即：支撑西部相当多人民生计、安定社会，以及衔接未来发展的更佳可能。



的东西。支持这一简单化思路的假设是：只要“关键变量”（如 GDP）上去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既然大势如此，那么不平衡问题就不过是历史的插曲，多样性的诉求就不过是多余的爱好，而这统统是支流问题。当然，有许多事实支持这一假设，然而说到底，这只不过是从一个层面、一个角度、一个时间段中得到的感觉。它只是运动在某一个坐标轴上的投影，而不是这个运动本身。真正的问题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对此，西部地区尤其要注意。

首先，大规模资源开发是否必然带动一个地区（或国家）全面现代化？这不是一个（投资的）量变到质变的“线性故事”。迄今为止，没有如愿挤进富国或发达地区行列，甚至落入资源优势陷阱的例子不少。对于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对社会进步的带动率比它带来的经济增长重要得多，因为贫困压力和人才外流，西部地区很容易用过高的机会成本去换取开发商的青睐。这个机会成本包括不断升值的自然资源的收益权。还有一种潜在的机会成本也不能忽视：在贫困地区，过快过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容易造成经济结构单一，从而减少本地人在更多样的行业和企业中学习和创业的机会（特别是配套行业太少时）。这是资源的繁荣之梦变成资源诅咒的重要原因。如果说难免有一些从原来使用的资源中“剥离”出来的人没有足够的新工作岗位或出走的能力，成为市场意义上“多余的人”，那么西部一些“富饶中的贫困”地区是否会成为他们的一个聚集之地呢。

其次，因为有东部发达地区的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地区，中国西部地区政策的模仿性相当大而探索性较小。而这种模仿（即“西移”）的理念一旦与现有政策实施系统结合，又会使政策变得愈加简单化和单一化。我们有些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比较封闭，有自我证明、自我加强的倾向。^①其最大问题是排斥了任何不同角度的观察，往往只反映上层决策部门自己的视角或强者的视角。这往往加重了社会利益失衡和对发展多样性的破坏。

总之，单一化的现代化过程可能带来少数人的繁荣，这就不是真正成功的现代化。我们的西部大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之路的战略，我们的投资者要警惕不要陷入“国内殖民主义”的套路。

^① 原因是：（1）为便于自上而下的贯彻，国家部门依赖于一套符合“可观性”与“可控性”的数量化指标体系；（2）由于“主指标”的完成就是实施部门的政绩，因而一般说它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也能完成；（3）由于利益固定在政策身上（如生态工程含国家无偿投入的资金），政策的对象很容易反馈说好——国家白给的钱，不要白不要。



四 多视角的好处

首先,区域发展研究天生就是多视角的:它是一门多种学科交叉的,而且越来越丰富、多元的学问。^①

更重要的是,多视角的研究尊重不同价值的独立性,能反映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的想法,有助于发展的平衡和制度创新的健康。任何利益群体都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发生冲突是正常的。或许有些人认为,那些“非新兴阶级”的意见是多余和“阻碍历史前进”的。这种颇为狭窄和势利的思想远离历史的智慧与进步的真谛。

19 世纪后期,美国工业的迅猛发展给农业社会及其主体——农场主(即美国的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生活方式与社会地位发生巨变,越来越受到垄断资本的控制,依附于铁路、银行、大公司、东部财团。早已有市场意识的农场主接受工业化的现实,但反对它存在的形式——垄断与公司化,并为此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从组织合作机构到组建第三党(人民党等)直至参加竞选。这些努力并没有赢得预期结果,也没有改变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大势。但 19 世纪农场主对工业化的反应在美国现代化道路上发生了深远的、有进步意义的影响。农场主对“垄断势力在其膨胀过程中对农民利益冷酷无情的侵占”和“基本维持生计方式被垄断”的反抗,他们与其他弱势群体(如劳工、黑人、妇女)一起对平等权利的呼吁,弘扬了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念并由于结合了国家干预原则,推动了这些观念进一步发展。人民党纲领中提出的要求后来被共和党与民主党采纳,成为 20 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 20 世纪 30 年代新政的重要内容,其中“工赈计划”成为新政的起源。有学者认为,美国适应工业社会需要的新秩序,即工业民主,正是企业界、劳工、农场主等不同阶层与职业的人组成利益集团进

^① 西方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建构上的发展说明它的多视角性和变化性。半个多世纪以来,仅从其理论建构的基本范式之演变就可见一斑。从 20 世纪 30 ~ 50 年代到 2000 年以来,它们依次是:区域地理学、新古典经济学、行为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复杂性理论、新竞争经济学、组织理论、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科学社会学、文化经济、制度与演化经济。引自苗长虹、魏也华《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论争》,《地理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55 页。